

理想主义 试验田 培养行业精英人才的

本报记者 陈彬



创业家学院 2020 年暑期 职业发展训练营中学生合影

从培养“专业精英”到培养“行业精英”，西交利物浦大学首先在理念上对“精英”的概念进行了重新解读。而创业家学院(太仓)的建立，更像是立足于“行业精英”培养理念上的一次探索与尝试。

直到现在，陈峻松都清楚地记得几年前自己参加一次行业峰会时，一位企业高管对与会嘉宾说的一句话。

“他记得中国的商学院教育落后于商业实践 10 年。”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陈峻松坦言自己听后心里有点不是滋味，但又不得不承认，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句话也有几分道理。

产生这一状况，陈峻松觉得并不能完全归因于老师个人。“这在更大程度上源于制度环境的影响。”正因如此，2003 年博士毕业后，陈峻松先后就职于多所知名商学院，但他依然在寻找一个理想的商科教育平台。

今年 6 月，他应邀加入西交利物浦大学，担任创业家学院(太仓)(以下简称创业家学院)产金融合学院的创始院长。在了解完创业家学院的育人理念后，他终于有了一种“志同道合”的感觉。

从“专业精英”到“行业精英”

作为江苏省内唯一一个既沿江又临沪的县级市，早在元明时期，太仓市便是我国重要的海港和商埠，如今的工商业门类更是十分齐全。2018 年，当西交利物浦大学(以下简称西浦)与该市签订合作办学协议时，这一点也是重要的考虑因素。

“因为我们想培养有能力在数字智能平台上，利用机器人驾驭并引领未来行业的高度复合型创新人才。”西浦执行校长兼创业家学院院长席西民如是说。

直到今天，这句话中的核心字眼还被写在创业家学院网站首页最显眼的地方。这句话看似有些“官方”，实则大有深意。

“首先必须说明，创业家学院想培养的是精英人才。”席西民告诉《中国科学报》，但目前我国传统的精英人才培养存在一个局限，即人才培养模式主要围绕某一个专业展开。因此，其培养的人才也被禁锢于某个专业领域内。然而，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今天，如果一个人的视野仅局限于某个专业

领域，缺乏专业协调能力、持续学习能力以及人机融合能力，无论怎样的“精英”都将面临人工智能的挑战。

席西民说，创业家学院创立的一个理念基础，便是专注于“行业精英”的培养。专业精英与行业精英一字之差，理念却大不一样。

“放弃以专业育人，转而以行业整合所有相关专业，从而培养学生从行业发展的角度审视自身的能力，再与计算机、工业平台和人工智能进行融合。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试图让学生在不再单纯创造某种新技术或新知识，而是能实现一种综合化的生活场景。”席西民告诉《中国科学报》，这就需要充分培养学生的行业融合能力和创新精神，以及跨文化领导力和企业家精神，孕育他们的智慧和心智。如此，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只能成为他们的工具，而无法取代他们。

培养行业精英人才，必然离不开行业企业或机构的介入。在这方面，被打上深深的“行业”烙印的创业家学院的一个典型特点，便是作为学校主体结构的首批七所学院，全部是按行业门类设置的，陈峻松所在的产金融合学院便是其中之一。此外，还包括人工智能学院、文化科技学院、智造生态学院等。

值得一提的是，每个行业学院由西浦及数家知名企业联合创立，企业与学校一道深入参与学院建设、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和教育与训练的各个环节，从而形成以行业整体发展为视角的融合式教育模式。

受访时，席西民特别强调，这些行业学院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由高校建立学院，再吸引企业参与某些教学实践的形式，而是真正意义上的“联合创立”。“也就是说，在学院的建立和运行过程中，学校与企业是地位完全平等的参与者。”

然而，问题也随之而来——如何调动企业参与育人的积极性？

在更高维度找到共同目标

在与创业家学院联合共建行业学院的企业中，中科曙光是最早签约的一家企业。谈及

选择与创业家学院合作的初衷，中科曙光集团副总裁郭莹坦言，校方对于未来人才培养目标的规划打动了她。

“在席校长的规划中，他们希望通过校企深度融合培养出能够适应行业转型的精英人才。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利用自身在大数据、人工智能、智能计算等方面的技术优势，通过联合建设学院，共同探索培养行业精英和业界领袖的新模式。”郭莹说。

对于这种模式，作为企业方的郭莹充满期待。而在西浦未来教育学院执行院长张海军看来，这份期待背后或许隐藏着破解目前企业方合作育人动力不足难题的“钥匙”。

“单纯从现实角度出发，企业方动力不足的原因非常简单，即传统校企合作育人模式对于企业关心的目标是没有贡献度的。”张海军解释说，企业需要的是盈利，是自身的发展，但这些都是传统校企合作模式所无法给到的。而这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依然在于专业化人才培养模式的桎梏。

具体而言，他表示，如果以专业化培养为目标，校企结合的最主要目的当然是要学生掌握某个专业的理论和知识。然而，某个专业的“ABC”根本不在企业的关心范畴之内，因为它们主要面对的是现实行业的竞争、发展乃至转型升级。这是一个极其综合化的问题，知识背景简单的专业人才根本无法为他们解决问题。

不过，如果将人才培养的目标从一开始就瞄准行业精英，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作为行业精英，首先是要关注和回应来自行业的挑战，特别是因为新技术发展而造成的行业重塑。这些问题是企业经营所最为关注的内容。因此，如果学校将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在行业层面，校企之间便可以在更高维度上找到共同目标，从而奠定了双方深度合作的基础。”张海军说。

受访时，郭莹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在她看来，当前国内很多校企合作中，高校的主要目的是谈就业和人才输出。但如果关注一下学校的人才培养计划，就会发现其并不是面向企业培养学生适应各种岗位的通用能力。

“学生可能拿了大量的证书，但除了适应某些特定企业的特定岗位外，并不具备广泛

意义上企业所需的岗位人才的必要素质，这也是很多校企合作不能有效展开的重要原因。”郭莹说。

“我们想做这样的‘极端分子’”

在培养精英行业人才的问题上，高校与企业找到了共通点。但在席西民的设想中，创业家学院进行校企融合育人的尝试，其目的却不止于此。

就在太仓模式的构想提出后不久，西浦校方曾召开专门的新闻发布会，邀请企业界和科技界的潜在合作伙伴参加。会上，席西民告诉与会者，西浦希望能和它们一起，共同“创造一个历史”。

何谓“创造历史”？

“在我们的概念中，所谓的‘校企融合’，应该是企业、社会资源与大学之间的一场‘婚姻’，由此产生出一种既非企业，也非大学的机构，用以培养适应未来世界的行业精英人才，而且能与合作伙伴一道引领该行业的未来发展。这便是创业家学院的最终定位。”席西民解释说，在此过程中，他们希望能为“以行业整合专业”的教育模式打造一个未来教育的方案，能为未来社会急需的行业或产业精英培养提供一种模式；最终，使高校和社会互动，形成兴趣导向、终身学习、创新创业的教育生态，为未来教育提供一种解决方案。

“甚至可以说，我们希望通过新模式下行业精英人才的培养，缔造一种新的未来社会生活方式和商业模式。”席西民坦言，这也在建设行业学院的过程中，创业家学院对合作伙伴的要求——如果企业没有这样的愿景和追求，便没有必要参与其中。

事实上，在校企谋求合作的过程中，的确有知名企业因为未能达到这样的“境界”，而被西浦校方拒之门外。

交谈中，席西民并不讳言他们的这一想法有些“理想化”，创业家学院便是这群“理想主义者”的一块“试验田”。不过，他觉得这样的“理想化”是值得的，因为“任何一个时期，站在当下的框架内看待世界都是绝大多数人的选择，而能做出惊人之举的先驱者，则一定是站在未来想象当下，并努力实践别人认为不可能的事情”。

“我们就想做这样的‘极端分子’。”席西民说。

“球员”才是胜负关键

理想终究是理想，更重要的是当下该如何实践。

截至目前，已经有 40 余家企业或机构与西浦合作，共同创建创业家学院。而据郭莹介绍，相较于其他校企合作模式，在创业家学院，企业需要承担的责任要重得多。

“我们既提供师资力量，也提供科研课题，还与他们联合申报大数据专业的本科学位。”郭莹说，在具体教学过程中，企业会全程参与课程设计，乃至学生本科毕业后，无论是出国深造还是继续读研，其整个人才培养架构的彻底打通，也是企业与学院共同完成的。

“企业在人才培养中的参与度如此之高，这在国内是很少见的。”郭莹说。

在陈峻松所在的产金融合学院，学生的主体专业为供应链管理。该专业学生彭婕当初在选择这一专业时，对于“供应链”只有一个模糊的认知，“感觉这个技术很新鲜”。而为了让他们对供应链的概念清晰化，学院的一个重要手段便是请企业专业人士为他们讲授课程。

如今，彭婕已经大三，但对于自己在初入专业时的一堂企业课程依然记忆犹新。“那堂课让我有种打开新世界大门的感觉。”彭婕说，整堂课程的内容都十分贴近实际，完全没有纸上谈兵的感觉。“那可以算是我的‘供应链’第一课。” (下转第 8 版)

中国大学评论



樊秀娟

同济大学教育评估研究中心主任

当今学界，诸如“××人才、××奖”等表彰性评价项目不胜枚举。所谓表彰性评价项目，是指这类项目一般是由政府部门或学会团体主办，项目大多以光鲜的名称给评价对象定性，有配套经费或奖金，入围者可以借此获得颇具权威性的学术资历。之所以称之为表彰性评价，是想将其与学者在教育科研活动中必不可少且不可少的过程性评价区分开来。

近年来，这类表彰性评价项目越来越多，评价主体和被评价对象还在不断扩大。但是，这是否真能促进学术繁荣？

显然，表彰性评价项目过多不切实际，因为表彰性评价需要充足又有显示度的学术成果做支撑。如果条件不成熟，却非要评出一个“子丑寅卯”来，最终还是落入“数数字”的结局，客观上这也是“五唯”难以破除的根源。同时，学术领域的表彰性评价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工作表扬和奖励，容易异化为对学者“分等”和“贴标签”等问题。

表彰性评价项目过多带来的严重问题可以归纳为三大方面。

一是耗费科研人员时间和精力，导致科研人员不能潜心科研。表彰性评价事关教育科研人员的学术身份，不仅影响学者的学术地位和声誉，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学者的学术资源和薪酬以及后续发展机会，所以绝大多数教育科研人员不敢等闲视之。然而，过多的评价活动势必会严重挤占学术人员正常的教学科研工作。

二是滋生学术不端和学术腐败，导致虚报造假成果横行无阻。表彰性评价的组织管理单位一般与课题委托方、成果使用方无直接联系，这就导致了评价往往陷入“数数字”的窠臼。学术评价一旦离开成果的实际需求及内在质量的把控，假冒伪劣产品就会蜂拥而至，因为利益与风险完全不对等。

三是争抢“帽子”成为科研目标，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出现。表彰性评价可能导致学者因获得了代表学术成就的“帽子”而一路扶摇直上，而那些埋头于科研却没有快出成果的学术“苗子”落选。更糟糕的是，国内学术评价“马太效应”严重，导致往往在无形中被“踢”出局。

综上，评价主体出于管理抓手或政绩的考虑，希望通过评价等手段来激励学者奋发图强、早出成果，出发点很好，但过多表彰性评价项目难免“为评价而评价”。在减少表彰性评价项目的同时，还要大力提倡学术评价回归本真，即学术评价无关成果主人的年龄、职务职称、学术头衔、资历、“帽子”和“门派”等因素，而唯成果内容本身。当下尤其要做好以下几点。

首先，建立“瓜熟蒂落”的立项结项复合模式。表彰性评价项目中占比最多的就是各种人才计划或人才项目，这类评选上的人称之为××年××人才的项目经不起推敲——人才哪有按年算？评上的叫人才，没评上的算什么？人才项目原本至多是对学者此前学术业绩的肯定，以及对其未来学术产出的预期，而现实是，入选项目者被戴上了“帽子”，科研起点直接变终点。

受“后期资助”课题管理模式的启发，中国法学会从 2019 年起尝试采用课题立项评审和结项鉴定合并的方式，申请人根据课题指南确定选题后即自行开展研究，以研究成果申请。课题“立项”与“结项”同时进行，在学术评价上有三个优势，一是不受申报者“出身”影响；二是不受申报者前期课题论证或自述影响，毕竟这些内容的科学性和真实性很难考证；三是不受人情关系的影响。

其次，改变“二次加工”的成果包装奖励方式。表彰性评价项目中还有一大部分是各种科技奖项。早前，国家有关文件就曾强调要控制奖励数量，提升奖励质量，调整奖励周期，这些举措十分必要。但笔者以为，简化颁奖手续也相当重要。

目前，大多数奖项项目需要申报者自行提交申报材料。学术团队为了提高“大咖”的胜率，可能会在整合材料时采取移花接木、同类合并、改头换面等手段，这种“二次加工”对成果价值提升和科学评价无丁点意义，相反却为各种“潜规则”大开方便之门。

因此，我们能否借鉴一下诺贝尔奖的提名制方式？由评奖主办方组织权威专家筛选并最终确定获奖人员。这样，既可避免申报人为准备材料而耗费时间和精力，又能让各种虚假包装以及因评选而起的拉帮结派、行贿受贿等伎俩无用武之地。同时，切实强化评价主体的责任意识，选拔出成果已产生重大影响并获得同行广泛认可的奖项得主，否则宁缺毋滥。

最后，落实“揭榜比拼”的科技成果发现机制。当前，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已成为各高校一项重要工作，而把立项视作大功告成的管理者和研究者不在少数。同时，大部分没有入围或者申报的科研人员其科研工作受到严重影响。如此“重申报、轻研究”的做法极不利于重大原始创新成果的出现。

因此，要坚决扭转各级管理部门和教育科研人员把心思耗费在课题申报书上的做法，建立公开、透明、可操作的国家基金课题“揭榜比拼”制度。在力促课题立项者全力完成课题的同时，也鼓励学术同行凭借实际成果“攻擂”。相信在现今科技发达的条件下，通过制定详尽规程和准则，能够实现评价的科学、公平和公正。如此，形成以“成果论英雄”的局面，让最优秀的科技成果和科技人才脱颖而出。

表彰性评价项目应大幅削减

通识教育大家谈

通识教育要回应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

李志民



李志民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副会长兼人才发展专委会理事长

通识教育是相对于专业教育而言的，强调“通”而非“专”，目的是为受教育者提供更为完备的“知识图谱”和“逻辑武器”，从而培养具有健全人格和独立思考能力的公民。一般认为，由于这种教育模式没有专业的硬性划分，学生们通过多样化的选择，有望实现自由且顺其自然的成长。

被奉为通识教育圭臬的《哈佛大学通识教育红皮书》提出，教育可分为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两部分。前者主要关注学生作为一个有责任感和公民的生活需要，后者则给予学生某种职业能力训练。两者有区别，但并非相互对立和割裂。红皮书建议的通识教育课程包括文学名著、西方思想与制度、物理科学或生物科学导论，以及涉及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的其他课程。后来，哈佛大学一直坚持要求本科生学习此类课程。

近十几年来，国内对高校开展通识教育的呼声很大，但在实施上往往“雷声大，雨点小”。大部分高校简单地将其理解为“选修课”，课程设置依旧偏重于学科专业的知识传授，教学形式照本宣科，教学内容过于浅显，难以达到通识教育对于学生能力培养和素质提升的要求。

中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普及化教育阶段，“双一流”建设开启了中国高等学校发展的新征程，也对大学创新型人才培养提出新的挑战。因此，通识教育必须与时俱进和进一步加强，并且要体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

首先，开展通识教育，必须要转变“为就业而教学”的观念。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看似是教育模式的简单差别，但本质上，其实是教育目的以及对教育本质的不同理解造成的。

在我国，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有培养“通才”还是“专才”的争论，并最终选择了苏联的“为就业而教学”的培养模式，所以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专业设置口径非常窄，就业目标很明确，而招生数量也基本按社会就业情况确定。这对解放后的经济恢复起到了重要作用。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对高等教育的重视以及众多教育模式的交流，这种趋势得以遏制，但是惯性却不可避免。尤其是随着高考人数的爆发式增长，就业问题日益成为关系到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无论是普通高校还是职业学校，就业依然是最重要的指挥棒。然而，由于既脱离社会需求又缺乏自我进化的动力，很多大学的学科和专业成了“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怪胎。

当前，要实现中央提出的“科技自立自强”，就必须依托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这就离不开通识教育。因此，高校要以加快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国家需求为己任，充分认识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回归教育本质，进一步强化和做好通识教育。

其次，通识教育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始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培育了博大精深、兼容并包、独具特色的中华文化。历史和现实都已经证明，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更谈不上发展和复兴。

国家反复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意义，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高校要开展通识教育，也需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人文精神的精髓，认真寻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精华，坚持将其融入大学通识教育中，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第三，通识教育的内涵和实践要与时俱进。当前，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错综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广泛深远，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加速渗透融合，新兴技术日新月异，科学范式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学科交叉融合不断发展。为此，中国高校在加强通识教育方面必须保持强烈忧患意识，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现实准备。通识教育的内涵和实践也要与时俱进，亟

待提升学生的以下几种素养。

一是科学素养。科学是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动力，科学素养通识教育一直是我国教育的短板。因此，应进一步加强培养连贯性，如在中小学加入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教育，在大学开设科学发展史通识教育，无论文科理科或工科商科，都要做好科学普及，掌握基本的科学知识和基本科学方法等。

二是人文素养。让各学科学生，尤其是非文科学生多学一些国学名著，多读一些历史经典，多谈一些人文知识，多赏析一些艺术作品，将中华民族深厚的人文底蕴转化为学生的境界、修养和素质，成为人才未来发展的坚实基础。

三是法制与道德素养。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要从国家战略的高度认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要意义，着力培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学生成为品德高尚、遵纪守法的公民。

四是信息技术素养。当前，我们已经进入信息时代，计算机和网络已经成为基本生活工具，通识教育应该增加计算机基本知识、编程基本术语等内容，并在信息安全、网络安全方面进一步学强。

五是自主学习素养。要教会学生如何利用碎片化时间学习系统知识；教会学生理性思维，把知识点形成知识环、知识面；教会学生用数据和逻辑把知识点和知识面抽象成知识体，即自主知识升维的能力。